

一生奉献给华大的毕启

金开泰



毕启 (Joseph Beech)，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7 年出生于英国吉斯斐尔德市，6岁时随父迁往北美。父亲是一个经营运输的商人，但经营不理想，家庭不富裕，所以他小学毕业后还辍学打了三年工，用打工的钱进入了一个神学院，完成中学课程后进入了惠斯廉大学，毕业后获文学士，以后还获神学博士学位。1898 年受美以美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先后在重庆、成都办学，曾在鹿依士创办的重庆求精中学，继满里之后任第三任校长，1904 年到成都任华美中学校长。1905 年参与筹建大学，1913 年任校长，1931 年改任校务长，1940 年回国，1954 年逝世。他一生的主要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华西协合大学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

建立大学的主导者。

1901 年，清政府将全国省、府、州、县的书院变为由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构成的现代学校系统。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取代古代教育的转折点。在毕启任校长的华美中学附近，四川也成立了高等学堂。这既推动新式学校的建立，也为传教士们发展西式学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同时感到，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于是兴致勃勃，要完成华东地区传教士们业已建立大学的目标。关于筹建的历史毕启在边疆研究学会的演讲及《杂志》1933—34 年第六卷中刊载的“华西协合大学史话”一文中记述得很清楚。在早期高等教育的规划中，差会都在考虑建立小的独立学院。1904 年秋浸礼会已有三名传教士和两名中国教师开始上课了。与此同时，任美以美会成都负责人的毕启便和甘来德 (Hzrry. L. Canright)、加拿大英美会负责人启尔德 (O. L. Kilborn)、杜焕然 (J. L. Steawart)、英国公谊会负责人陶维新 (R. J. Davidson) 在成都商谈后认为“除非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力量，与政府的标准一致，并且以值得赞扬的基督教运动的方式进行工作，”否则差会的工作是不会成功

的，从而形成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草案，提交华西差会顾问部商讨。1905年5月，华西差会顾问部通过了这个草案。11月顾问部通过成立“小学和中学联合教育委员会”对华西所有教会教育进行规划；成立“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筹建大学。他们聘请了芝加哥大学的波尔顿和张伯伦教授在成都考察后，提出了建设蓝图，把第一份申请送达美以美会、浸礼会和英美会的总部。但是差会的总部却以资金筹措和差会间难以协调的困难而予以拒绝。他们尽管失望，却未气馁。又重新起草一个新的章程，提出采取“牛津体制”，即每个差会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自己的资金和设备，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牛津体制”既解决了各教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毕启被派回纽约和多伦多，霍德敬被派回英国向国内理事部报告。这个方案经多次讨论最终被理事部接受，为大学的建立奠定了完善的基础。

筹集经费，建筑校舍的操办者。

还在1907年他们选定成都南门外即后来的华西坝作为学校永久之地，首先在这里找到了大约150亩可购买的水田和墓地，加拿大教会提前支付了第一张支票，开始修建简易的临时建筑。1913年毕启当选为首任校长后，便开始筹集经费，根据英国建筑师荣特易的设计，开始修建永久性建筑。他在“华西协合大学史话”一文中也记述了筹资的趣事。首先向四川省当局和民国政府募得大洋万元，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宦，两人各捐银3000元以示倡导；民国三年他面见袁世凯，争取袁个人给大学捐赠了4000元大洋。对这些官员他都强调“说明来华之目的，非持条约之权利，实欲获得此邦人士之同情。”为筹措建校经费，他先后15次横渡太平洋回国及在中国内多方游说筹集办学经费，经手的中外各界捐款达400多万美元。他每到一处，不论资本家、教会人士、中国的官吏，都主动去拜会，争取同情与赞助。曾在中国赚了钱的资本家、发现铝的霍尔捐助50万美金作基金。更多的人则是捐资建筑。在他的主持下，十几年间，年复一年地争取各种捐赠，修建了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39幢。如美以美会 JCYu 及亚克门柯里斯1914年捐建的亚克门华美宿舍；1925-1926年捐建钟塔和大钟；纽约长岛北岸的罗恩甫夫妇为纪念白槐氏1915-1919年捐建了怀德堂（行政楼）；加拿大哈利法费的霍特为纪念赫裴氏1915-1920年捐建合德堂（赫裴院）；高琦夫人为纪念其父1919年捐建高琦中学；

美国印地安纳波利斯万德门家族 1920 年捐建万德堂（明德宿舍，经迁移改建后的现第六教学楼）；热心发展医学的夏威夷医生嘉热尔顿 1924 年捐建嘉德堂（生物楼）及常年维护恒款；英国伦敦亚兴登 1925 年捐建雅德堂（广益宿舍）；美国阿伯丁赖懋德为纪念其子 1926 年捐建懋德堂（图书馆，含历史博物馆）；重庆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 1927 年捐一万大洋修协合中学礼堂；英国嘉弟伯理 1928 年捐建教育学院；华西加拿大差会的前任建筑师莫理森 1942 年捐建药剂楼；加莫力生夫人捐资修建女子学院第二幢建筑等。华西协合大学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便是在他的操办下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为此张凌高在向四川省政府及教育部申报褒奖中称：“窃本校务长毕启博士，于前清末年，梯航来蜀，辛苦迄今，已将三十载，所募校产建筑，约值四五百万，造就学生，已达数千人，当兹抗战期间，惟四川留此广大校地，故南北大学之沦为异域者，犹得退处后方，从容讲习，而本校医牙两科又为西南各省之先导，近复加修实习医院，募款亦为五十万元以上，其大部分亦为毕启一人独力募集，良由诚信素著。故为舆论乐推，人望悉归，故使众擎易举，赤手而起万间之广厦，匹夫而赞百年之大计，此其劳绩可称述者一也。”

大学教育中反映出的毕启的教育理念和作为。

作为一个校长，他治理学校的理念是最值得关注的。从学校的实践可以看到毕启倡导并坚持了开学时高起点，严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倡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和生活教育，使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的办学理念。

华西协合大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创建者们有欧美大学教育的经验，所招收的学生须中等学校毕业或程度同等者。而且先经预科再正科。课程在波尔顿的报告中，要求不要照抄英美的，但实行中却难免。除中文、中史外，教材多采用国外的。实验设施保证了基本需要。实行学分制和特别生鼓励办法，考试不及格者予以淘汰。他和周忠信、客士伦等在通信和文章中对实业教育有不少讨论。他认为“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在 1917 年教会高等教育会议中进行了检讨，档案中记录着：“如果学生的命运是由学校掌握的话，那么应认真研究一下他们的实际需要，教学大纲也应围绕着它。这就是要认真研究毕业生将来职业的特殊需要，及如何有效地培养他们。要研究教会学校对政府制定的教学大纲应接近到何种程度，能否按政府的教学大纲行事而比政府学校办得更好，它在什么条件下能为整个教育体系做出开创性

贡献。”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榷》中他提出：“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详细论述了办学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训等。他总是要求学生树立追求不断的创业精神。一次他对毕业生讲话中，特别以他的中文名字鼓励大家毕业就是开始创业。他说：“你们今天是不是就算毕业了呢？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有记载他曾和中国最大的民营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卢作孚合作督造桥梁，与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校则把实业教育与实验教育、生活教育结合起来，十分重视华西协合大学培养的学生要“真正实用于社会”。在他管理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农学等。学校开办了女子教育，1924年9月7日他在事务所门口迎接报到的8名女生。她们步入大学，后来成了四川历史性的人物。为保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努力与西方接轨，1922年学校取得了纽约州立大学赋予颁发文凭的临时特许状，193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使学生的文凭在美国能得到承认。这对华大能形成一种好学风是有积极影响的。

当然，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境下，他必然是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1925年毕启发表的文章中称：“目前这个伟大国家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掌握在毕业于基督教学校的人们手中……我们相信，若在四五年内将周密的计划付诸实现，则将决定中国半个世纪的未来。倘若我们25年前如此聪明在日本抓住了同样的机会，那么太平洋中部的局势……是会有极大不同的。”充分反映了传教士实现天国的理想，“要用基督教教育，感化四川人民”，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这种目标却渐行渐远，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西融会，推动大学中国化中与时俱进。

外国教会所建大学的中国化是经过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才实现的时代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及随之而来新文化运动，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尽管学校于1913年就经四川省总督胡景伊“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但在二十世纪20年代全国掀起的“非宗教运动”高潮中，他难免不站在基督教一边。他强调“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忠于他们的教师和他们的学校，参加校外的运动就是破坏校誉，就是不光荣的事”。他在1923年的报告中赞扬1922年一些学生退出抵制日货时说：“教师与学

生的关系，从来没有比过去一年更加使人感到兴奋，学生对他们的教师和母校表示忠诚，首先表示他们对本市学生会的态度上，他们拒绝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在其他地方每每发展为无法无天的示威游行，他们不愿参加一个足以污辱他们校誉的运动，以致损害他们大学的良好声誉，这样的行动表现出勇敢和良心觉悟，使近来一些大商人和官长们有根据地声称，他们希望基督教教育，能够给中国当前的邪恶提供最好的补救办法。”但随着冲击和形势发展，教会学校，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现代派传教士，接受了学校与宗教分离，满足中国青年求知渴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要求，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革，使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中国高校体制的一部分。毕启在四川多年，对四川有深切的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在四川的代表人物是尊敬的。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合影中，堂堂的洋校长却站二排。在外聘教授来校任教中，重视中西兼及，聘了合格的西洋教师外，也聘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如廖平、刘豫波、龚道耕、程芝轩、林山腴等来校任教。1922年校理事部通过由中国上层、赞助者、友好人士组织一个大学议会，协助制定华大未来的政策和工作进展。中国政府1925年11月颁布了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的命令，1928年教育部又颁发了私立大学立案条例，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范了大学、学院的设置后，学校被迫开始向中国政府的立案程序。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反帝运动，华大学生第一次组织了退学团，迫使托事部1925年9月承认理事部开始推动的改革，提出“大学将以基督教的名义服务于中国人民，实际上很快地成为一所纯粹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属于中国教会和由中国人来任教、管理及资助的大学”。同意理事部拟开展的政策：向中国政府立案；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加重中国文学及历史的教学；逐步地增加中国人在教职工和理事部中的比例。1926年发生了“万县惨案”，学生声援万案，在英国教师的怂动下，他采取压制，辱骂学生“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读书，要抗议外国人，这简直是一件可耻之事”，激起了更大的退学与罢工罢教浪潮，迫于形势他终于认识了错误，向学生道歉，允许改进校政，达成了相关协定，“决意今年多聘有学识的中国教员，执教本校”。11月理事部决定向政府申请立案，1927年10月正式向省政府呈文立案，1928年1月9日省教育厅训令“各节大致尚是，准予先行备案，以利进行，仍候转咨查核立案可也。”1929年毕启向大学理事部提出的设立

临时校董会及章程遭到了托事部的否决，迫使副校长张凌高提出辞职，重新激起了华大学生的爱国斗争，1930年掀起了反对学校未经批准修围墙的群众斗争，并组成了华大接管委员会，迫使学校停课，学生锐减，职工罢工，毕启一度情愿以300万美元，由政府收买。后经调解达成拆墙、不强迫学生信教、华人参加管理等协议。他再次修改了校董会章程送托事部建议试行，并将立案工作交由校内理事部全权处理，推举张凌高为主事校长。1931年5月张接任校长，毕启改任校务长。在此过程中学校亦按大学组织法的规定，经过了调整充实，正式建立了文理医三个学院。1933年他在报告中说“我们希望，一个基督教大学生，他献身和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会做得更好。在混乱时期，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无情和肤浅的破坏与抛弃。”这年9月获得教育部“准予立案”的批复。学校发生了里程碑的变化，开始了中国化的新篇章，并为她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自此以后学校便成了按中国政府规定，经中国政府批准，由中国人主持校政，受中国政府补助，“以教授高深学术，培养高尚品格，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私立大学。毕启在东归时也委托李晓舫在记述他的文章中强调“望中国人士明了华西大学乃中国人所办理，为中国人所设置，绝非西人之大学。他表示不独希望本校之毕业生返校合作，即其他之人士，亦甚盼其赞助与维持，使华大日臻完善繁荣之境。对于伟大之建国事业，尽其应负之职责，其个人前驱开辟之事迹，至微末不足道云。”为此张凌高在向四川省政府及教育部申报褒奖中称“自辛亥建立民国以来，川局纷扰，绵历岁年，凡教会所办学校，环境稍殊，误会常起，本校在民二十三年立案以前，此等事件，随时有之，盖中枢兼顾既所不及，地方保护亦有未遑，于是横逆之来，有加无已，毕启或时留校，或值返国，即遇纠纷，则竭排解，远念发展，则函电商筹，上纾政府交涉之劳，下为学校根本之计，务持大体，用协群情，故能使本校培养成长，以有今日，此其劳绩可称述者二也。又自毕君居蜀以还，岁月既往，经历日广，如川省地方民教交涉事由，历次内战，疏解经过，与夫本校民十五事件，苏道璞博士事件，校地被毁事件等，事势迫切，档案动滋疑误，具在历历可稽，毕君身在其间，无不竭智尽虑，调停区处，或遭嫌怨，或冒艰险，卒能使主客相安，众情悦服，此其可称述者三也。”

历史进程中所受的评价。

1913年10月6日四川总督胡景伊行文称“……美国毕启博士……联合英美名

彦创办华西协合大学于四川成都之南门城外，其救世济人之宏愿精进不已，至足倾佩，顾建筑校舍造端宏大乃更发大愿回国募集巨资期成厥事……又深感博士不惮艰难始终其事，故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之热心救世济人之事业者。……异日环球大通，风同道一，和平之庆洽必将以此举为鸣矢也。”

1914年11月20日袁世凯称：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寓吾国四川境，凡十有五年，与其贤士大夫相习。自蜀至京者，咸乐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合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方今环球棣通，学术思想，日趋大同，充博士之志，愿同文同伦，不难企及，兹之设教犹先河也。

1916年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敬祝华西协合大学词称：

立国之本，曰富与教。富以厚生，教以明道。原人之素，维身与心。心失所导，厥弊顽冥。贤哉西哲，有教无类。万里东来，循循善诲。文明古国，中华是推。文明大邦，英美是师。宏维西贤，合炉冶之。我来自滇，共和是保。戎马倥偬，未遑文教。瞻望宏谟，深慰穷喜。我有子弟，何幸得此。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西，山高水长。

1944年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系主任孙恩山在美国《AsisandAmerica's》发表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中写道：卢先生认识了创办华西大学的美国人毕启博士。由于毕启博士的帮助，卢先生熟悉了美国生活和文化最好的一些方面并获得一些美国办的机构的帮助。反过来，毕启博士也从卢的成就中找到了最好的证明，证实他长期怀有对中国人民前途的。

1940年毕启告老回乡之时，张凌高在向四川省政府及教育部申报褒奖中称：具文陈述毕君在川兴学劳绩，谨恳鈞府鉴察，烦予分呈院部，应否查照各省外籍特殊勋绩人士成例，持准转呈国府明令，破格褒奖，授予勋章。”经教育部核准“部填发捐资兴学一纸，奖状一纸，既题赠‘捐资兴学’四字”。经教育部申报，中国政府最后批准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的先例，授予他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蒋介石为其书写了“乐育英才”的匾额，授勋后受到蒋的接见，蒋还发表了书面褒扬。



1947年10月3日他的八旬寿诞时，学校举行数百人庆祝会，为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制作的毕启纪念塑像揭幕。会上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天文学家李晓舫介绍其生平，撰文《教育家的毕启先生》称赞，详述了毕启一生的作为与品格。赞扬他以一商人子，富经营创造之能力，如从商，在北美，不难成巨富，享尊荣；而独凭一己之信念，积四十年之努力，远离祖国，在华西，开创了一番新事业。虽孑然一身，贫俭如故，敦得敦失，必有能辨之者。

美国历史学家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论及大学在扩大经费来源和较大的师生团体中取得成功时指出：强有力的校长和行政人员往往能够自然而然地取代差会成为学校的决策人，毕启和行政会就享有最后的决定权。

1963-1965年《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的有关文章中均给他加上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受特定时代的影响显而易见。

1990年正式出版，由第五任校长马俊之主编，1993年获四川省历史学会优秀奖，中国高教学会专著二等奖的《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中称：“他担任校长、校务长30多年，经手为华大向中外各方筹集的捐款即达400万美元，并经办了学校的主要建设。他是一位对华大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评价。

1954年毕启在美国芝加哥逝世，其时，在当地的十几位华西大学学生参加了奠祭。据学生们回忆，他的逝世孤寂寥落，“只有毕师母与一个女儿守在旁边，显得十分凄清。”就这样既非富豪，也非美国政要的毕启，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正直的后来者也许可以从他那英俊的脸庞，充满希望、深邃的眼神，以及饱含热忱、坚毅与执着的神态中得到些许的安慰。

参见：李晓舫：教育家的毕启先生及有关资料；温江译：华西协合大学史话；